

第一章

机器引起的争论——早期改良派 经济发展思想线条

1776年，小小的地球上发生了三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美国宣告脱离英殖民统治而独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瓦特发明的第一台蒸汽机正式投入使用。^①一年之中三件大事并发，标志着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无可比拟的崭新时代。其中，蒸汽机之用于工业，宣告了手工生产时代即将过去，宣告了一种新生产力的诞生，从此，工业革命掀起了它的序幕，机器生产大踏步走向人间。这之后大约半个世纪，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向工业化进军。工业化的浪潮以其磅礴气势席卷着西半球，也冲击着东半球。

当资本主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以其廉价商品向全世界倾销时，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仍然处于十足的手工生产时代，过着近乎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朝野上下根本不知机器为何物。当帝国主义以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后，大清帝国无坚不摧的神话破灭了，“天朝无所不有”之梦化为泡影。然而，当时大多数国人对此仍然迷惑不解，企图加以拒绝。一直等到1898年，中国人才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首次喊出了“定为工国”呼声，要求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这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中，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洋枪、洋炮、洋货、洋机器同中国固有的

参见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49页。

人口、资源、就业和传统之矛盾，中国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掀起了一场又一场争论。中国最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产生、经受熏陶与锻炼而弯弯曲曲地成长，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艰难地开始其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寻求。本文的分析就以这个背景为出发点。

第一节 早期改良派面对的三大压力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外力冲击之下破土而出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事物。这就注定它的生长发育要承受更大的压力，经历更曲折的道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命运也是如此。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固有的各种压力已经齐集在他们面前。他们必须推开这些压力，否则他们就无法前进。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面对的第一个压力是中国人口的出路问题。这是因为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已成为令朝野深为不安的大事，因而各种呼声不绝于耳。

远的且不说，在 1820 年，被称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包世臣就有了反驳“民穷在于人多”的言论，证明人口问题当时已成为上上下下一个重要议题。包世臣写道：“国家休养生息百七十余年，东南之民，老死不见兵革，西北虽偶被兵燹，然亦不为大害。其受水患者，不过偏隅，至于大旱，四十余年之中，惟乾隆五十年、嘉庆十九年两见而已。宜其丰年则人乐，旱干水溢，人无菜色。然而一遇凶荒，则流离载道，屡受丰年，而农事甫毕，穷民遂多并日而食，何也？说者谓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敷口食，此小儒不达理势之言。”尽管包世臣自己否认已出现人多地少现象，并且

认为“人多则生者愈众，庶为富基”，但他有时也不不知不觉地承认：“东南地窄，则弃农业工商”^①。与包世臣差不多同时，另一个知识分子吴铤也指出：“东南民溢地寡，而田不足给。西北荒地多不治，民皆游手坐视，无以为生。”^②其他诸如此类论述尚有许多，但这些已经足够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已有的人口危机感。

鸦片战争后，关于人口过多而土地不足的议论不但未息，甚至可以说趋于激烈，这表明人口严重性与日俱增。例如，具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冯桂芬就不光承认人口过多，而且认为它是导致人民生活贫困和社会动乱的一个根源。他写道：“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数倍乾嘉时，而生谷之土不加辟，于是乎有受其饥之人，弱者沟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篋、大焉斩木揭竿矣。”^③若要举更为极端的例子，则有人所熟知的汪士铎的人口论。他的《乙丙日记》中到处充斥着对人多地少的描述，诸如：“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子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殫矣。”又如：“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等等。按照汪士铎这里的描述，不但农业人满，就是手工业也已人满。如果说汪士铎在是个顽固分子，因而不免有夸大其辞之处，那么奇怪的是，连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薛福成也有极为类似的描述。薛福成在 1891 年的《出使四国日记》中，先是对清代人口的激增做了对比。他指出，康熙四十九年，民数约 2300 万多；乾隆五十七年，已增至 30700 万多，比康熙年间增加了 13 倍；到道光二十八年，又增至近 42000 万多。接着，他满怀感慨地说：“余尝闻父老

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上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8～9 页。

《选辑》，上册，第 57 页，第 324～325 页

谈及乾隆中叶物产之丰，谋生之易，较之今日，如在天上。再追溯康熙初年物产之丰，谋生之易，则由乾隆年间视之，又如在天上焉。无他，以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焉；以昔居一人之庐，而今居二十人焉。”显然，他把现在谋生之难归因于人口之大量膨胀。最后，他像汪士铎一样描述了人浮于地的困境：“今欲筹补苴之策，谓中国地有遗利与？则凡山之坡、水之汙，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汊，均已垦辟无余。抑谓人有遗利与？则中国人数众多，人工之廉减于泰西诸国十倍，竭一人修岁勤动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畜。彼知力终不能自贍，则益好逸恶劳，或流为游手，为佣丐，为会匪者，所在多有。”^①在这里，他也把人口过多与社会消极现象和动乱联系在一起。

以上所举这四个人的论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们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既有地主阶级顽固派，也有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并且对民食益艰所开的处方也不同。然而，有一点却是他们共同承认的，这就是：在当时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和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对于能够利用的资源（主要是耕地）来说，人口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某些地方（东南）甚至已到严重超员的地步。尽管也有人否认人口过多的观点，但从实际看，这种否认是很勉强的。根据现代学者的计算，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均耕地只有 2 亩多，若亩产谷 2.5 石，则一年人均谷数只有 5 石多，还不足一人一年食用之需，更不用说佃户交租纳税之后的情景。^②可

《许巴墨西哥立约招工说》，见《庸庵文外编》卷 1。按：文中所记康熙四十九年人口数不确，因为当时统计的是丁口数，实际人口比这多。参见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4 页。

② 参见马伯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43 页。另外，有些外国学者也认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农业已陷入了“高度平衡陷阱”的阶段，即除非有制度、技术和耕地面积的重大变化，否则粮食产量已很难随人口增加而增加（见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28 页。

见，人口确实已是困扰当时中国的一大问题。中国人口的出路何在？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面对的第二个压力是中国 2000 多年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重农抑商观念和盲目自大心理。这些传统观念和心里一遇到新的洋货冲击，便转化为一股巨大的抵制洋货、反对学习西方的力量。

早在洋货来到中国之前，封建统治阶级上上下下面对上述人口问题和农业生产危机，已经重新掀起了一场重本抑末、驱民于农的舆论声势。著名的顽固派分子谢阶树就老调重弹地坚持只有农业才是本，农业创造的财富才是“本富”，而工商则是末，工商所得是“奸商黠贾操其奇赢”的结果，是“末富”，因而毫不犹豫地主张“致富莫如劝农，而保富莫如抑商”。^①这种论调与历史上所有抑商论并无二致。与此同时，各种禁烟禁酒论、崇俭去奢论以及无可奈何的限田论又纷纷登台表演。

这种迂腐思想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视一切新奇之物为“奇技淫巧”。因此，洋货一到中国，他们马上想到的是其危害性，想到的是它与“重农抑商”的格格不入，因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有名的顽固分子管同说：“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洋货在中国流行“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因此，他大声呼吁：“宜令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②就连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龚自珍，也认为当时的洋货，如钟表、玻璃、呢羽、燕窝等等，不过“悦上都之少年”，“皆至不急之物”，因而“宜皆杜之”^③。有的顽固派虽然感到洋货之来无法可禁，却企图通

参见《约书·保富》。

《选辑》，上册，第 170、53 页。

过严格地禁止有身份之人的使用，逐渐达到驱除排斥洋货的目的。徐鼐就是这种人。在他看来，如果使有身份的人穿着洋衣使用洋货有罪，别的人也就不会效仿，从而洋货就会“不禁而自不行”^①。很显然，这些言论的用心，并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利益，而不过是要让中国重新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维持原有的封建制度和秩序而已。

不可否认，封建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人尽管感到洋货之威胁，却主张用积极办法对付西方事物。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就可归入此类。他们隐隐感到：中国之技术工艺确实不如西洋，所以对洋货战也战不过，堵也堵不住，因而主张学习西方之长技，制造新式船械，以求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他们比较客观地看待外国新式制造品，提出了“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的观点，给了某种公正评价。如魏源所说：“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②这肯定了西方现代生产力对于民生的益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③这显然是在鼓励民间一道加入“师夷长技”的行列，从而是允许发展民间新式工业这一主张的先声。在这基础上，冯桂芬更进一步发表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明确提出中国有不如西方的地方，“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呼吁实行“自强之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④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对待洋货从而对西方事物的争议到此并未结束。当清朝统治者为了更有力地对付

《选辑》，上册，第 193、129、131 页。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农民革命和维护其统治尊严而决定实行自强措施，开展洋务运动时，范围更加广泛的争论随之而展开。从 1867 年到 1880 年短短 13 年间，封建守旧派与主张自强和求富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就进行了四次较大争论。第一次发生于 1867 年，争论的主题是要不要撤销同文馆；第二次发生于 1871 年，争论的主题是福州船政局要不要续办；第三次发生于 1875 年，争论的主题是要不要用机器生产等等；第四次发生于 1880 年，争论的主题是要不要修筑铁路。在后两次争论中，围绕着要不要办新式工业，又牵进了人口与就业之争，从而使人口与机器之争联系在一起。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中国是否应该继续走重本抑末的老路，这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面临且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面对的第三个压力来自地主阶级洋务派所倡导的官办和官督商办。

应该说，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在与封建守旧势力的斗争中曾经携手并肩过。这是因为，改良派和洋务派都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艺的必要性，而且早期改良派人物大都担任过洋务派要员的幕僚，从而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洋务派的阶级基础、根本目标不一样，因而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两者的矛盾和对立逐渐显示了出来。

洋务派官僚虽然主张发展新式工业，然而他们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只是企图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封建生产关系。因此，洋务派主张发展民用工业，不过是为了提供军用工业原料等的需要；主张“稍分洋商之利”，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尊严而已。他们的发展目标显然是使一切新式工业都由官办或置于封建政府的统辖之下，而无意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点从洋务派官僚的论述中体现得清清楚楚。

李鸿章是较早提出设立船炮厂和铁厂以求自强者。然而他主

张设这些厂是要“以铸造枪炮充军用为主”，至于制造织布、挖河、犁田诸机器，他认为“目前未能顾及”。这表明，他把军用生产放在首位。如果说政府无力办民用工业，那么应该让民间自由去办吧？可是李鸿章没有这种念头。相反，他却担心一旦官府办起新式工业，民间就会有人效仿。用他的话说：“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①。为此，他一开始就主张，对于在官府工业中掌握了新式生产工艺的人，“当随时设法羁縻”，不让他们流向民间。当清政府因为财政无力而使单纯官办工业难以存继时，他又马上出来献策，主张实行“官督商办”。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这放松了对谁可以办工业的限制，其实，这是要借民间资本之力，来补官资本之不足。由于控制权掌握在清政府手里，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到头来只能是为清政府的财政需要服务。正如曾在官督商办企业服务多年的郑观应晚年时愤怒揭露的那样：“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为了保证这种官督商办企业的垄断地位，李鸿章又主张对民间资本的发展加以严格限制。例如，在洋务派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坚决主张10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很显然，李鸿章心目中并没有民间资本的地位，他向往的仍然是封建社会早已有之的官府垄断经营。

另一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比起李鸿章来，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官督商办问题上，张之洞一直强调官的作用和重要性，处处表现出对商办的不放心。1885年，他就广东设立官督商办矿务局一事说道：“大抵商人自谋，约有数弊：一不能延聘真师，二不能考寻善地，三不能烹炼得法，四不能得货即售。”^②似乎交由商

《选辑》，中册，第347页。

《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71，奏议。

办就会一塌糊涂。因此他认为只有官与商“二者相辅”，才能尽收其利。其实，他关心的并非“商人自谋”的难处，而是官府的控制权。戊戌变法阶段，当官督商办已经声名狼藉，成为众矢之的，商办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时，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其中照样对商办进行了恶毒攻击，对官督进行辩护，说什么“且华商陋习，常有借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在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在他眼里，民办就等于罪恶，等于混乱，非有官府的管制不可。

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一贯压制贬低商办而强调官办和官府控制，表明他们从来未曾想过要允许民间资本的自由发展，而是企图继续维持封建社会早已有的垄断经营方式。究竟中国新式工业的发展应该官办、官督商办，还是民办好？没有政府的管制民间工业究竟能否独立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必须回答的第三个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这样一产生就面对三大压力或者说三大难题。到底他们能否顺利排除这些难题继续前进？或者他们在难题面前败阵退却了？应该说，早期改良派不但能回答这些难题，而且在回答过程中提出了他们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线条。

第二节

早期改良派对西学和工商业的态度

本节开始，将分别论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如何克服面对的三大难题，从而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设想。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学和工商业的态度。

如前所述，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当西方的机器制造品突如其来进入中国时，马上遭到传统力量强烈反对。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洋货更加源源不断涌入，另一方面洋务派主张自强求富，也使中国有了自西方引进的新式工业及机器制造品。这些更引起了顽固守旧派的极端仇视，因而挑起了前面所说的四场反对学习西法和创办新式工业的争论。

总括四场争论中顽固派的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他们看来，“祖宗成法一一具在”，只需“次第修复”，就不怕不“足以资捍卫而固藩篱”，根本不存在“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因此，他们大骂洋务派乃“弃中国数千年成法改从外国”，“病国殃民，无所不至”^①。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腐朽守旧的思想。由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学习西法看做“欲用夷变夏”，即要用外国的东西来改造中国，从而极力加以诋毁。顽固分子杨廷熙在呼吁撤消同文馆时，就把这班人的内心世界抖露得清清楚楚。他的奏折写道：“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②在这里，那种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维护祖宗成法不变的古态又作了重演，而根本无视世界的天翻地覆变化和中国落后挨打的深沉忧患。难怪连同治皇帝也要把他的奏章斥之为“见识拘迂”、“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③。

《选辑》，中册，第432页。

③ 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6年）。

既然祖宗之法不可变而西方之法无可学，那么顺理成章的，就只有固守陋习，从而“重农抑商”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封建主义顽固分子无一不视引进西方新式工业为“以商工而夺耕牧之具”，以一副悲天悯人、为民请命的腔调诋毁机器生产。在他们看来，像西汉初年的制度那样，“商贾不得衣纨帛，商贾之子不得仕宦，是法之最善者。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道；重士抑商，所以劝德行而立制治之本。”^①其实，“广生财之道”是幌子，而使民愚昧即所谓“勤朴”才是他们的目的；“立制治之本”是为了强调封建专制统治，而“劝德行”则是要求人民也像他们这些“吏禄三百石”的人一样，只讲所谓的义而不讲物质利益，无欲无求。所谓“商贾所不到，嗜欲无自生，粝食粗衣，此外更无他求也。”^②这是他们极力推崇并力图强加给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

由此可见，顽固派之反对学习西法，主张继续重农抑商，最终目的仍然和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一样，想把人民钉在小农经济的柱子上，使其安土重迁，愚昧驯服，无所追求，用以实现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然而，他们的可悲之处就在于看不到世界已经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威力已从外部敲响了中国封建制度的丧钟，中国已经到非变不可的时候了。与此相反，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言人，则看到了“世变”的必然性，并力图顺应这种必然性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因此，面对着顽固派煽起的狂涛恶浪，他们决不能无动于衷。

打蛇打七寸。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首先对顽固派的要害点“祖宗之法不可变”进行了驳斥。他们指出：历史本来就处于不断变的过程中，“物极则变，变久则通。”王韬就此以中国为证写道：

《选辑》，中册，第 416、427 页。

“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神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半球，而海外诸国，有星罗棋布。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在这里，王韬不仅明白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的大变动，而且客观地描述了秦汉以来之变的特点：人类视野扩大了，交往频繁了，各国通商互市已成为定势。面对这“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也就是面对一个比自己繁荣发达的外部世界，还能“视若无事 动循古昔 不知变通”还能企图“驱而远之”？显然，这已经是“势不能”也。因此，中国只有变法一道可走。郑观应也指出：“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今日世界已“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限之也。”^①薛福成进一步指出：“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②改良派的这些论述，有力地反驳了顽固派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

既然“变”已是不可阻挡之势，那么就必须破除“用夷变夏”之论。郑观应尖锐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自谓居地球之中，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6 页。

《郑观应集》，上册，第 435 页。

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结果造成了今日“孤立无援，独受其害”的恶果。他正确批评了那种以华夏为中心的谬论，发问道：“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①这就明示：中外之间决无尊卑之差。既然外国不是什么夷，而西方国家技艺比中国进步，经济比中国发达，中国就应该向西方学习。这决不是什么“用夷变夏”，不是什么屈尊。因此，早期改良派认为在今日中国“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者”。中国必须承认不如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承认风帆比不上轮船，骡马赶不上火车，刀矛敌不了枪炮。在此基础上，“竭我之心思财力，尽我之智慧经营，以仿效其所长”。如此才能指望追赶西方，与之匹敌，甚至超过它。否则，夸张粉饰，蒙蔽模棱，拘墟胶固，深顽固拒，一点也改变不了积贫积弱、蒙耻受辱的局面。

既然要学习西方，就面临一个问题：向西方学习什么？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实际上敏锐地看到了中国“重农抑商”而国家贫困，西方“国计以商贾为本”而发达的事实，因而力主学习西方就得摒弃“重农抑商”的教条，重视发展工商之业。早在 1879 年，薛福成就看到了重农抑商与西方国家发展现实的矛盾，而力图加以调和。他说：“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②这里，第一句是对中西的比较，证明农工商对富国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互相补充；第二句揭示西方国家致富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工业为基础。1890 年他又一次就商业的地位问题发问道：“夫商为中国

《郑观应集》，上册，第 67 页

《选辑》，中册，第 57 页

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开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薛福成自问自答说：“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①显然，中国与西方对商业截然不同的态度使薛福成感到有必要作一番深思：究竟商业对于其他行业有害还是有利？深思的结果，他得出结论：商业起着沟通生产和消费，充当市场晴雨表的作用，因而与各环节联系最广，起到关键作用。他进而认为：“此其理为从前九洲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详，西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这就明确指出：重农抑商说已经不合时宜了。1893年，他在《振百工说》中又就工的地位做了辩解。他说：“圣人之制，四民并重，而工居士农商之中，未尝有轩轻之意存乎其间。”^②所有这些都是在驳斥传统的“重农抑商”说，论证农工商之地位并重，互相沟通而又互相促进，都是在呼吁必须重视发展中国的工商业。

商人出身的改良派人物郑观应，更具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思想。他曾从一正一反两方面证明了商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系。他说：“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③他又说：“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④郑观应的这两处论述与薛福成差不多，现在人们大都认为郑观应的话是对薛福成的抄袭。其实语言可抄袭，思想不能抄袭，郑观应的

《选辑》中册第60、63页。

《郑观应集》，上册，第607、593页。

一个明确思想是：“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是因为以前交通不发达，一个地方的人如无足够粮食供自己所需，遇有灾变就有饥患的威胁，所以不得不以农为本。现在不同了，铁路、邮电、轮船使交通极为发达，商业大为繁盛，这时候，“商务所趋给民之食者十之一，给民之用者十之九”，人们的生活用品大多数有赖于商业的提供和调剂。因此，商业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看出，郑观应这里所说的商，指的是经济间的交换活动，不单纯是商人，因而也具有强调商品经济而反对自然经济之意。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之主张农工商并重甚至突出商工的作用，除了反抗传统“重农抑商”教条外，还在于要唤起人民警惕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商战，呼吁发展商工业以挽回中国失去的利权。当时，西方制造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而中国只有丝、茶和少量药材等可以输出，“总计彼我出入，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疮，数千余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①，漏卮日甚一日。改良派对此深为忧虑不安。郑观应惊呼这是西方列国在对中国实行商战。在其《商战》系列论文中，他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目的在于夺取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打仗，在于“借和约为兵刃”，对中国实行商战。中国如不警惕奋起，以商御商，势将“精华销竭”，膏血尽罄，就算有兵将如云，舟师林立也枉然。因此，他呼吁“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呼吁“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②。为了振兴中国商务，他认为必须设立商部以保商，讲究种植、制造、贩运、销售，“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此外，他呼吁要“重订税则，厘正捐章，

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只有做到这些，方能够使“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从郑观应这些思想可以看出，他希望通过发展国内农工商诸业来和平地与西方国家竞争，收回我国应有的利权。郑观应的论述集中表达了早期改良派的共同思想愿望，其实也反映了当时民间资本的善良愿望。

应该说，到此为止，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顽固派反对学习西方、重申重农抑商的腐朽观点已作了很好的反击。从这些反击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改良派面对西方列强的兵战和商战，深感民族经济危机重重，因而力主必须摒弃不合时宜的祖宗成法，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以工商立国为起点，发展民族工商业，以与西方列强竞争，使国家摆脱贫弱的困境。尽管他们在学习西方问题上表现得还不彻底或者说拐弯抹角，他们对重农抑商论从怀疑到否定，却是完成了一件重要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任务。人们承认，在传统的技术和手工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极其落后，农业生产量主要取决于农业劳动量的投入，因而容易使人产生“一夫不耕而天下或有饥者”的思想，似乎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从而重农抑商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到了机器生产时代，农耕技术和农业生产条件极大改善，农业生产大为提高，从而有条件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从事其他产业，以丰富人类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继续认为只有人人务农才能生财，因而坚持重农抑商就毫无道理，其结果只能束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顽固派反击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看到并非只有农业才能富国，就是工商业也能富国，因而呼吁要顺应时代潮流，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如果联系到下一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力主的“机器养民论”，即新式工业也是生财之道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已基本从理论上明确了农工商的关系。正是这种理论上的成熟，才使他们能宣判在中国肆虐几

千年的“重农抑商”论的死刑，使其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混迹不下去。这就为继起者们清除了部分思想路障。

当然，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驳斥“重农抑商”论和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时，并没有提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而且，他们在考虑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时，似乎也想得太简单了，仿佛这不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而是可以一蹴而就似的。不过，这些问题就是在后来的维新派身上也同样存在，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应苛求于他们。

第三节

早期改良派对机器生产的态度

应该说，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面对的前述三大难题是相互交错从而很难分开论述的。他们对工商业的态度就和解决人口难题的办法交织在一起，但为了行文方便和深入论证，我们还是单独把其对人口难题的解决设想加以专节分析。

早期改良派面对的人口难题由于机器的引进而趋于复杂化。本来，在机器引进之前，就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而言，中国人口相对于有限的耕地已经呈现出饱和状态，因而使许多人忧心忡忡，深感不安。现在，西方的机器、轮船、铁道又要进入中国的

在这方面，郑观应可能比较现实，他看到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发展工商业有些不能马上办到。他说：“窃尝究英国商务之所以兴旺者，其故有十三端，有为中国之可及，亦有为中国之难骤及者：曰地气清和，曰矿产甚富，曰国内水陆便利，曰海口多。此四者中国固有之，无不可及者也。曰百工技艺娴熟，曰首创机器擅利独多，曰资本甚巨，曰程法尽善，用人得宜，曰商船多，曰五大洲皆有属地，曰言语为商务通行，曰通商历年最久，曰近日出口货无税，进口货亦不尽征。此九者他国亦有难兼，中国所未能骤及者也。”（《郑观应集》上册第623页）。